

【書評】

## 中國圖書出版的「典範轉移」

### ——讀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

鄒振環\*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蘇精

《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

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ISBN 978-986-350-025-4

第一次聽說蘇精教授的大名是在上一個世紀的九〇年代初，其時我剛剛完成了一篇關於京師同文館譯書出版的論文。那些年兩岸交流受限，儘管已從他人論文的引述中得知蘇精教授在 1978 年和 1985 年先後完成出版了《清季同文館》和《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兩書，但仍然無法獲取這些著作。記得學校參考閱覽室的一位老師還鄭重其事地告訴我，臺灣有兩個蘇精，一個是研究同文館的，還有一個是研究藏書家的，著有《近代藏書三十家》。若干年後才恍然大悟，其實研究同文館和研究藏書家，是同一個蘇精教授（為免繁瑣，下均直呼大名）的兩張學術面孔。

---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zouzh@fudan.edu.cn](mailto:zouzh@fudan.edu.cn)

## 一、挑戰自我的成果

蘇精出生於 1946 年，1972 年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1976 年進入中央圖書館工作。由於不滿意既有的關於晚清同文館的研究，經過幾年的努力，他首先完成了《清季同文館》，該書分十一章，分別討論同文館成立的背景、京師同文館的成立及其演變、館務行政的經費、課程與教學、師資、學生、京師同文館的問題、上海廣方言館、廣東同文館、清季同文館的成效等。作者不僅全面梳理了同文三館的資料，討論了同文館與四譯館、俄羅斯文館之間的淵源關係，研究了同文館的譯書課程，並整理出非常翔實的《京師同文館出版西學圖書書目》，張朋園在該書序言中特別推薦，稱該書的特點是重視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和廣東同文館三館的比較討論。<sup>1</sup> 1984 年他又在舊作的基礎上，修訂增補，進一步從同文三館的老師和學生生平和著述入手，完成了新作《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使中國近代外語教育史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的拓展。同時，在工作之餘，他流覽館藏善本古籍，每見書中歷代藏書家累累鈐印和朱墨圈點的題跋，發願收集藏書家的資料予以整理介紹，經過大約五六年的努力，完成了《近代藏書三十家》。該書是一部清末民初藏書家的小傳，從盛宣懷、葉昌熾、盧靖、李盛鐸、梁鼎芬、葉德輝，一直討論到張元濟、董康、梁啟超、丁福保、鄭振鐸，介紹其家世生平、藏書聚散經過、所藏內容特點、編印校勘或著述，以及與藏書有關的行實。各篇自 1979 年起陸續在《傳記文學》、香港《明報月刊》、《中央圖書館館刊》等雜誌上連載，於 1983 年集結成書，由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初版。二十多年後的 2009 年，該書還被認為是「開近代藏書史研究之先河」的論著，<sup>2</sup> 全書經作者修訂，由北京中華書局重版，據說初印 4,000 冊，五周內即銷售一空，又加印了 3,000 冊，可謂洛陽紙貴。

蘇精不是那種一輩子滿足於一畝三分地不斷耕耘的學者，就在撰寫近代藏書家故實的同時，他已經對中國書籍如何從傳統的木刻線裝轉變為西式的活字平裝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一方面因為工作上的困境，更重要的還是緣於學術興趣的轉換。1992 年，他竟然辭去了安身立命的中央圖書館的優裕工作職位，以將近半百之年負笈英國里茲 (Leeds) 大學，攻讀「書目、校勘與出版史」的碩士學位。英國的碩

<sup>1</sup> 蘇精，《清季同文館》（臺北：蘇精 1978 年自印本），〈張朋園序〉，頁 3。

<sup>2</sup> 蘇精，《近代藏書三十家》（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編後記〉，頁 275。

士僅僅一年，其中有一個學期撰寫碩士論文，他選擇了英國傳教士麥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和墨海書館作為碩士論文的題目。期間還要兼顧上課、書面作業和印刷實習。一年回臺後卻無法找到合適的教職，於是他孤注一擲，賣掉了棲身的小屋和所有的藏書，於 1994 年初再赴英國倫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成為無家可歸的過河卒子。經過歷時三年的博士訓練，1997 年以倫敦傳教會的中文印刷事業為論題，獲得了博士學位。

回臺後他先後任教於南華管理學院出版學研究所、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系、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輔仁大學和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他以西方傳教士與中文印刷出版史專家的全新面貌出現在學界，2000 年完成出版了《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灣學生書局）、2005 和 2006 年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先後推出了他的《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和《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兩書，又再接再厲，寫出了《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1819-1846》（臺灣清華大學出版社 2010 年）。2014 年 7 月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推出了他厚達 595 頁的新作《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下簡稱《鑄以代刻》）一書。勇敢地面對人生的挑戰，使他在退休前後的十多年裡，留下了五本都足以傳世的佳作。

印刷史的研究，可以從傳統的目錄版本學入手，研究範圍偏重於圖書的形制、鑒別、著錄、收藏等方面的考訂的探討；或可從書籍史的角度切入，注重圖書發展的各種相關問題，如斷代和地區性的刻書史，印刷工匠或刻書機構，活字、版畫、套印、裝訂等專題的敘述和分析，難度最大的是從印刷文化的角度展開，從印刷技術的變化和影響加以分析，進而研究這種變化對學術、社會、文化等方面產生的後果，這就需要作者具有社會學、科技史、文化史等多學科的知識準備。蘇精早年在圖書館積累了豐富的圖書目錄學的知識，後又系統接受過西方印刷史和書籍史的訓練，並積累了深厚的基督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知識。正是因為有這些重要的學術準備，才能使作者在《鑄以代刻》這一精細之作中為我們勾勒出西方印刷術自西徂東和活字印刷技術由南而北轉移的清晰圖像。

## 二、檔案如是說

《鑄以代刻》一書主要探討基督教傳教士自 1807 年來華至 1873 年為止的六十餘年間輸入西式活字以取代木刻印刷中文的過程，詳細地描述了傳教士們是如何創

立與經營西式中文印刷所的活動。全書除「導言」外，分為十二章，一、從木刻到活字——馬禮遜的轉變；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澳門印刷所；三、麥都思及其巴達維亞印刷所；四、中文聖經第一次修訂與爭議；五、初期的墨海書館 1843-1847；六、偉烈亞力與墨海書館；七、香港英華書院 1843-1873；八、美國長老會中文印刷出版的開端；九、澳門華英校書房 1844-1845；十、寧波華花聖經書房 1845-1860；十一、華花聖經書房遷移上海的經過；十二、姜別利與上海美華書館，後附錄參考書目和索引。作者在討論這一「變局」的過程中突出獨創性，略人所詳而又詳人所略，不僅對於別人的研究力求避免重複，對於自己以往的成果所涉及過內容也不再重複討論，如對倫敦會為主的墨海書館的研究儘量避免和他人研究的重複，而於長老會部分，如澳門的華英校書房和寧波的華花聖經書房則詳細展開，嘗試繪製西方印刷術來華傳播比較完整與清晰的畫面。作者謹守專業，就題論說，甚少引申發揮，有一份材料說一份話，使全書的敘述格外嚴謹。

「檔案如是說」是蘇精部落格的一個總標題。讓「檔案」來言說，充分運用中外檔案，幾乎堪稱是蘇精所有研究論著中最大的特色，《鑄以代刻》第一個特色也是充分運用檔案。早在 1979 年初，他在撰寫《近代藏書三十家》過程中，在中央圖書館發現了一批 1933 年在南京創館到 1948 年遷往臺灣為止的舊檔，其中有部分是關於當年購買古籍的記錄，於是他以此舊檔案為基礎，並參照其他資料，撰寫了〈抗戰時秘密收購淪陷區古籍始末〉一文，發表在 1979 年 11 月的第 35 卷第 5 期《傳記文學》上，並作為《近代藏書三十家》初版的附錄。<sup>3</sup> 在研究同文三館的過程中，他也是利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的「出使設領檔」等。<sup>4</sup> 在英國留學期間，蘇精幾乎每天都與傳教士的檔案和手稿朝夕相對，1997 年回國後，他繼續沉浸在縮微膠捲的英文檔案中，這些檔案包括倫敦會檔案、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馬禮遜父子檔案，以及美國長老會外國傳教部檔案、美部會檔案、聖公會傳教會檔案等，至 2010 年先後抄錄了二百六十多萬字的傳教士檔案。上述《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和《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三書，都是他孜孜不倦地利用英國各圖書館檔案機構保存的傳教士檔案，如倫敦會、英國東印度公司等機構的檔案等，以及馬禮遜等人的出版品，辨析相關史實，以多個嶄新的角度呈現第一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與中文出版之關係，以及馬禮遜的親友同工斯當東、

<sup>3</sup> 蘇精，《近代藏書三十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頁 223-236。

<sup>4</sup> 蘇精，《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上海：上海印刷廠 1985 年自印本），〈自序〉，頁 1。

米憐與馬儒翰；馬禮遜施洗的華人信徒蔡軻、梁進德、屈昂等的生平行事及與馬禮遜的關係；馬禮遜在中國與英國教學中文的經驗以及關於他的研究文獻。而《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1819-1846》一書，則是他利用在新加坡設立布道站的四個英美傳教會檔案，重新建構並解釋了基督教傳入新加坡的背景與經過，討論傳教士對華人的講道、教育、出版與醫藥等事工內容，並從檔案中發現這段期間共有十三名華人受洗成為基督徒的事蹟，從而更正了以往認為當時沒有華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誤解。《鑄以代刻》與作者之前所撰寫的所有著作類似，均據第一手資料——傳教士的手稿檔案完成。所不同的是，他將視野範圍從之前倫敦會和美部會的檔案擴大到長老會的手稿檔案，從中他抄錄了四十五萬字的書信內容，透過對大量資料之爬梳，發掘許多鮮為人知的印刷機構的歷史、印工的故事，探討了傳教士的印刷與鑄字工作。

檔案言說的主要功效，就是能夠對很多史實作出較之前人更精細的結論和更準確的判斷。麥都思和墨海書館是蘇精碩士論文的選題，也是他傳教士中文出版研究的重要起點。該書第五章根據倫敦會檔案提供了麥都思 1843 年 12 月 24 日抵達上海開始籌建，1844 年 1 月 23 日或 24 日將印刷機器帶到上海，並於 1844 年 5 月 1 日正式印書的準確時間。也讓讀者知道了該館印刷的第一種新書是《真理通道》，是該館初期「最重要的一種傳教出版品」，總印數超過六十萬頁。<sup>5</sup> 關於墨海書館究竟停業在何時，學界至今爭論不休，作者根據現存的倫敦會華中地區的檔案中 1865 年 12 月 8 日慕維廉寫給同會秘書梯德曼的信，說明墨海書館在過去的五年裡一直由自己經手管理，期間還印刷了十萬部新約與《五車韻府》一書。1866 年 8 月中，他還向穆廉斯在彙報結束這一書館的進度，可見該館結束在 1866 年，同時也證明《五車韻府》是由墨海書館而非美華書館重印。<sup>6</sup> 美華書館從 1860 年創辦至 1932 年結束前後持續七十一年，這是近代傳教士在華設立的最重要的新教出版機構之一，但遺憾的是至今尚無關於這一機構的專門學術論著，即使關於該館初期的館址究竟在哪裡也眾口不一，或說是大北門外，或說是大南門外。作者通過詳細材料的比對，準確地說明了 1860 年該館是設在上海虹口長老會上海布道站購買的緊鄰克陞存住宅旁的一處房地上，1862 年遷至小東門外的新館舍，1875 年 10 月遷往北京路。<sup>7</sup> 1867 年該館出版的《美華書館中文、滿文與日文活字字樣》一書中出

<sup>5</sup> 蘇精，《鑄以代刻》，（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頁 175、188。

<sup>6</sup> 同前引，頁 225-227。

<sup>7</sup> 同前引，頁 473-478。